

Opinion

Observer | 上证观察家

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美国官员语)的今天,油价飙升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美国完全应该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规范市场投机行为,停止美元的过度贬值,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能源技术,不能为转嫁危机而继续推高油价。

油价飙升是美国的核心理益吗?

刘洪

是什么造成目前油价持续飙升?近期《上海证券报》刊登一篇文章认为,油价飙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也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点。高油价肯定与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有莫大关系,也确实可以说,美国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不能就此得出油价飙升是美国核心利益这一结论。

量,从油价上涨中获取更多好处。所有油价飙升成因而和美国有一定关系,但从供求关系上看,油价飙升对美国没有好处——美国是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很大一部分石油靠进口,油价暴涨的直接后果是其支出增加,同时带动国内通胀。另外,油价飙升,普通美国人更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可言,最喜欢开车的美国人现在也是怨声载道。

口,刺激美国经济,转嫁美国经济风险。但换一个角度看,贬值可能是市场必然选择,美国长期积累产生的“双赤字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说,就必然会导致美元贬值。

是第二位的。从油价飙升的后果来看,美国也是受害者。油价飙升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相对较小,而美国为避免经济衰退,也愿意忍受这点阵痛。但由于目前通胀威胁越来越大,美联储也不得不放弃“降息政策”,并面临油价飙升失控让美国经济脱轨的危险。

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如同美国在能源、粮食等问题上指责、甚至“妖魔化”中国的错误言论一样,上网上线地批评美国也不是可行之举。

那是什么造成了目前的高油价?美国政府的主要观点是“供求不平衡推高了油价”,开出的“药方”是OPEC增产、中国加强能源体制改革。OPEC则把原因归结为:一是投机资金的炒作,二是地缘政治的紧张。除此,还有一个与美国相关的更直接和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元的持续贬值。美元贬值使产油国实际收入减少,产油国也更乐于控制产

从投机问题上,这种状况存在已久,有市场就有投机,但投机往往不是依附在其他原因上的,投机一时可以,长期投机,且将油价推到一个离谱的价位,在操作上并不容易,也不可行。油价飙升中肯定有投机的因素,但投机应该不至于导致一半以上的涨幅。这也是尽管不少发展中国家支持“投机推高油价”论,但许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同的原因。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美元贬值导致油价飙升问题上,美元贬值不过是美国当前经济政策的副产品,并不是主要目的。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巨大威胁下,美国政府过去一年最先的任务就是拯救美国经济,其他问题都

可以肯定地说,油价飙升绝对不是美国的核心理益,进一步讲,即使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元贬值造成的油价飙升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得出这个结论,绝不是为美国政府辩护。只是希望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焦点问题上,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冷静以对。简单的思维、情绪化的言辞,如果只是谈判的一种策略,可能还无所谓,但如果据此付诸实际行动,则不仅无

在应对高油价问题上,其实各大石油消费国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美中应合作寻求解决之道。这一点也已是中美两国政府的共识。但从现实来看,油价高涨对中国的冲击要大于美国,而油价上涨很大成因而来自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发达国家,美国完全应该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规范市场投机行为,停止美元的过度贬值,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能源技术,不能为转嫁危机而继续推高油价。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美国官员语)的今天,油价飙升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也是当美国施压中国加快能源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更应该针锋相对的理直气壮之辞。

房价下跌不会影响金融安全

傅新

7月9日,有学者撰文称:“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开发者的融资难度加大,房地产市场滑坡让开发者的处境更加艰难,楼盘销售不畅,开发者的资金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该学者认为,房地产市场滑坡,相应的贷款会减少,会使银行的盈利下降。另一方面,已发放的贷款风险会上升。结论不难得出,让紧缩政策对开发商松动。

有一个观点,由于说的人多了,便几乎成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房价不能下跌,具体点,房价下跌不能超过30%,否则,就有可能影响金融安全。正是基于这种理由,在住房成交量萎缩而房价并未明显回落时,一些开发商便呼吁对房地产业网开一面,以免引发中国式次贷危机。

房价下跌30%会威胁到金融安全吗?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有充分理由以保持房价的上涨通道不遭破坏,房地产市场将永远繁荣一片。但事实并非如此,1997年至2003年,我国香港地区的房价下跌了70%,按照香港金管局的统计,当时被称为负资产的住房就达78000宗,但既未威胁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也没有引发金融危机。为何?

第一,并非所有的商品房都是用贷款购买的。这种情况在我国内地可能更为明显,许多高收入者更愿意一次性付清房款。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开始,上海市选择一次性付款买房的人占比例40%—50%,而进入2008年以后,由于贷款利率提高,一次性付款买房的人已经占到60%以上。

第二,并非所有的贷款买房者都是高价位买房,也并非所有的贷款买房者都是集中在近一年内买的房。银行房贷业务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过去的贷款存量是非常庞大的,那些在2007年以前贷款买房者,如果房价下跌30%,银行根本无所谓,因为仅2007年的涨幅就不只30%,更何况银行还有一个30%的首付,更何况此前贷款者已经连续多年偿还银行贷款,与庞大的存量住房相比,高位买房者只是少数,房价的下跌不足以对银行的整个承受能力构成威胁。

第三,房贷在整个银行贷款业务中的比例有限。央行2008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3月底,全国商业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9.4万亿元,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5.01万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8万亿元,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6%左右;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3.13万亿元,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1%左右。两者合计,也只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7%,即使不良贷款比例上升,也远不至于威胁金融安全。

G8峰会难以扭转农产品价格走势

陆志明

八国集团(G8)首脑峰会于7月7日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开幕,其首脑宣言就经济形势指出,全球经济“依然存在滑坡的风险”。同时草案还指出,八国集团对原油和食品等原材料商品价格飞涨感到强烈担忧。几乎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涉及敏感政治话题的报告指出:生物燃料促使全球粮食价格上涨75%,其中牵涉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能源利用上的矛盾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生物燃料多数是从本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成本收益比来考虑的,换句话说,相对于发展其他作物来提取生物能源,玉米、大米等农作物是相对廉价的产品。而国际粮价是否会因此而出现大幅上涨则在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考量范畴之内。

然而,就目前全球农业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出口的大半壁江山,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么人口数量众多,要么地理环境恶劣,在大米、玉米与小麦等农产品方面则居于净进口地位。一旦西方发达国家将大量粮食用于开发生物替代能源,那么势必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造成压力,从而推动全球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而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求论”不过是用于混淆视听。

毕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对高质量食品的需求也不可能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各国之间的食品消费倾向也存在极大的差异,如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稻米、谷物为主的饮食消费习惯比欧美发达国家以肉类、肉制品为主的消费习惯在粮食消耗方面要低得多。并且在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流。而其间必然伴随着相关农产品生产技术的进步与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本国相对廉价资源开发生物替代能源的“国际副产品”。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的态势下,期望通过道义上的谴责来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完全放弃粮食替代能源的计划存在巨大的实际操作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与碳排放问题类似,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在找到更好的替代途径之前是不会放弃已有的计划。

从G8峰会的宣言草案中不难看出端倪,北海道洞爷湖峰会将讨论和拟定的有关粮食问题的“特别宣言草案”,并未涉及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生物替代能源的任何限制性措施,八国集团对增加粮食供给的表态也极为含糊其词,不得要领。

让上市公司重务正业

姜淑霞

最近,多家财经媒体报道称,中国证监会正在酝酿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再一次修订,此次修订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基本没有改动,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由15项增至20项。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证监会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盈利作为发行新股、再融资及ST公司摘帽的考核标准。

非经常性损益的修订,不仅牵涉到发行新股、再融资及ST公司摘帽的考核标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上市公司务正业。

我们知道,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许多上市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都大幅度增值,有的翻了好几倍,这大大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业绩,使得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在整个业绩中的比例反而退缩到了次要,甚至微不足道的位置。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2007年,不包括金融类公司,94家上市公司持有的A股以交易性金融资产计量,以当年9月27日收盘价计算,市值合计高达42亿元。

大量来自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收入,使得上市公司从中尝到了甜头,一些上市公司开始忽略来钱慢的主营业务,而专门拿出大批资金投资,有的干脆直接参与炒股,充当起了基金的角色。他们希望通过增加投资收益,增厚每股收益,推高本公司股价,在股权激励、解禁股抛售等方面获得实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因为非专业的上市公司短期投机色彩更浓,由于操作经验不足,更容易追涨杀跌。而且,上市公司由于用的是低成本融资来的钱,它比基金更容易产生赌的心态。倘若盈利了,是公司高管们的功劳,倘若亏损,则由广大投资者承担。这使得它更有豪赌的胆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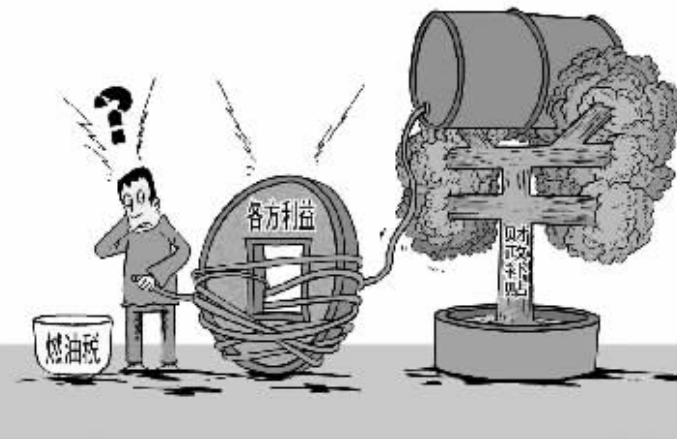
因此,在2007年的牛市中,培养出了许多因交叉持股收益翻番的上市公司,也培养了一批不务正业的上市公司。但是,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旦股市走入弱势阶段,上市公司的投入就可能从盈利变成亏损。如果上市公司,原本主营业务国内领先,是行业的佼佼者,但由于经不起诱惑,冷落主营业务而去自己并不擅长的股票投资,最终损失惨重。

对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修订,意味着主营业务与非主营业务收益的界限更为分明,这对上市公司做好主营业务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实际上,上市公司存在的基本意义首先就在于做好自己擅长的主营业务,以促使其在行业内脱颖而出,提高民族企业的竞争力。

燃油税不开征威胁我国石油安全

魏也

7月9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曾晓安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国家将结合当前形势,根据节约能源和道路交通税费改革的总体要求,不断完善燃油税的改革方案,择机开征燃油税。



燃油税开征受阻于“择机”长达10年之久。1999年通过的《公路法》修正案,将开征燃油税正式列入法案,上升到法律层面。随后出台的《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对我国燃油税的纳税人、纳税环节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当燃油税的推出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时候,却一再搁浅。

油巨头经常以国内不含燃油税的油价与国际包含燃油税的油价进行对比,强调国内油价的低(如目前的情况);国内油价低的时候,国际油价更低,国内油价相对仍然是高的(如2006年和去年年初,国际油价下跌而国内油价不调整)。

桥费等,交通部门将减少直接收入,同时由于失去上路稽查的机会,而减少其他收入。三是地方政府。养路费目前被列入地方政府的收入,一旦将其纳入燃油税,地方与中央将重新分配,而无论怎么分配,地方都不可能再专享,加之部分路桥收费也归属

面着手,以降低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开征燃油税,加之通过财政补贴维护低油价,导致石油消费浪费严重。数据显示,我国每辆汽车每年消耗的燃油,超出日本的一倍还多,同样的车我国行驶里程更长,使用率更高。据我所知,在日本,不少家庭一般在周末外出旅游的时候才开车出行,平常乘坐地铁、公交车等上下班,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人上街买菜都开着车去。由于油价便宜,许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不考虑节油问题,甚至盲目追捧大排量车,这种消费理念已经变得畸形。另外,由于国内油价里面不仅不包含燃油税,还包括财政补贴成分,使得我国油价与国际油价价差拉大,国外的轮船、飞机乘机在中国加油,分享中国的“补贴”,导致福利外流。这种外来需求的放大,同样会加大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使我国原本就脆弱的石油安全变得更加脆弱。

此,许多人把燃油税不能开征,归结为油价太高,这种托辞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第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开征燃油税的时候,将低油价作为必要前提。第二,油价的变化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油价的高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国内外油价本身就是一个互动关

系:国内油价高的时候,国际油价更高,国内油价相对而言仍是低的(如目前的情况);国内油价低的时候,国际油价更低,国内油价相对仍然是高的(如2006年和去年年初,国际油价下跌而国内油价不调整)。

二是交通等有关部门。一旦开征燃油税,取消养路费和过路、过

但是,应该认识到,如果继续被相关利益集团设置障碍,导致燃油税迟迟不能推出,将给我国的石油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当今,石油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理论上来看,石油对外依存度越高,石油安全系数越低。倘若没有其他方面弥补这一短板,石油安全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也非常高,但它通过在海外控制资源,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弥补自己的短板,提高了石油安全系数。

因此,燃油税已经不能再拖延,拖延下去,将对我国的石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Column | 专栏

宏观调控要正视经济下滑风险

由于总需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收缩,宏观经济有下潜的风险,在抑制通胀压力的同时,保持适度的总需求,使经济不至于衰退,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适当的调整,总的框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结合。

王福重

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显示,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行情的一致合成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回落,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继续下行,经济景气呈持续高位回落的态势,报告据此认为,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

退,应引起宏观政策部门的高度注意。

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居民的资产性收入主要是储蓄所得和股票市场的收益。由于银行的实际利率一直为负,储蓄所得利息几近于无。而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已让绝大部分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剧,导致多数居民的消费增加无望。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收缩,宏观经济有下潜的风险,在抑制通胀压力的同时,保持适度的总需求,使经济不至于衰退,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国内外需求发生变化,短期内又难以继续增加的时候,扩大国内需求,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应该成为未来保持总需求的主渠道。为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适当的调整,总的框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结合。

基本解除。这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央行连续不断提高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利率相互叠加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次贷危机,美元疲软、油价高企、粮价上升,继续执行单一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仍是适当的,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不期然地使原本纠正经济过热的目标可能提前实现,而且有可能会矫枉过正,造成经济下滑。所以,未雨绸缪,防止经济表

看,在短期,宏观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所以,无论是控制通胀,还是阻止经济衰退,其核心都是调节总需求。

再看企业投资。企业投资意愿与财政、货币政策直接相关。虽然贷款利率是负利率,但是由于央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受到抑制,企业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具有最大拉动作用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越来越困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多年一直高涨的企业投资需求终于被打压下的变化,都提示了经济下滑的信号。

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第一是减税,特别是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的起征点,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放松税前扣除标准,以便让消费者增加可支配收入,保持较旺盛的消费需求,同时使企业增加税后利润留存,保持适当的投资热情。第二,增加对个人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让这部分人群在CPI不断攀升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还要加快工资制度改革,较大幅度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人群的工资水平。另外,中国有至少一亿股票市场投资者,为了提高居民的资产性收入,打造一个健康稳定的证券市场,显得特别重要。

扩大国内需求,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应该成为未来保持总需求的主渠道。为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适当的调整,总的框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结合。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总需求